



的蛋壳黑陶高柄杯
龙山文化遗址出土

【文化观】

东夷的『有色眼镜』

□本报记者 张九龙

其实是周人发明的

在一般公众的认知中，“夷”“蛮”对应的是落后的蛮荒之族，因此不少人对“东夷文化”也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的。追古溯源，东夷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东西南北四方，为什么没有北狄文化、南蛮文化而独有东夷文化？9月底在临沂举行的第六届东夷文化论坛上，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对东夷文化进行了解读。

提起东夷文化，许多人或许觉得遥远。毕竟，如果从北辛遗址算起，它离我们已经有八千年之遥，即使是“年轻”的岳石遗址，距今也有四千年。然而，东夷又离我们很近，东夷族主要活跃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太昊、少昊、舜等中华民族公认的祖先都是地地道道的东夷人，甚至连传说中的上古第一大反派蚩尤也是出自东夷。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从时间上看，东夷文化应从北辛文化算起，经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其发展具有连续性；从地域上看，东夷人的活动范围大体在今山东境内。

对东夷文化的定位，山东地方史学界泰斗、山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安作璋教授直言：东夷族是中华民族的主要族源之一。“来自黄河中上游的‘西夏’族和来自黄河下游的东夷族构成了华夏族的主要族源，太昊、少昊、舜、皋陶、伯益等东夷族领袖都曾担任早期华夏族的领袖，东夷族在华夏民族发展史上作出过重要贡献。”城市、文字、冶铜技术乃至反映等级制度的礼仪设施，这些文明的基本构成要素都是最早在龙山文化时期聚集形成。“因此可以说，龙山文化是中国早期文明的起点，而龙山文化正是东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在公众的认知中，“夷”“蛮”应当是落后的蛮荒之族才对。经过专家的解释才知道，“东夷”这个概念，其实有“两副面孔”。

“孔子长期生活在山东一带，但是《论语》中只有‘九夷’而无‘东夷’，而《孟子》中有舜‘东夷之人’的表述，据我理解，《孟子》里所说‘东夷’应该是指今豫东鲁西交界地区的古夷人。”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张富祥看来，东夷的“有色眼镜”其实是周人发明的。《礼记》中的“东夷”，基本上是与“北狄”“西戎”“南蛮”对应的，后世习惯上将四者统称为“四夷”，是与“华夏”相呼应的概念。“这种概念出现较晚，西周以来逐渐形成，泛指中原周边的少数民族。这种概念以中原地区的周王朝为尊，刻意贬低了其他地方文化的地位。”现在研究东夷文化，要把这种少数民族意义上的“东夷”与古老的渊源深厚的“东夷”区别开来，不能把东夷文化定位于落后的少数民族文化。

从考古发现来看，东夷文化确实不一般。春秋时期东夷诸邦国主要位于鲁东南、鲁南、胶东半岛，还有一部分分布在鲁中南华夏诸邦国内。“目前，考古发现的东夷诸邦国在文化上与华夏邦国有所不同。例如，东夷诸邦国的贵族墓地位于远离都邑，并具有特殊的棺槨制度；墓中随葬有大小相同的铜鼎，并多有殉人、殉狗现象；铜器上有罕见铭文，且铜器、陶器的种类和器型都独具特色。”

事实上，东夷文化不仅没有大家想象中原始落后，反而内容丰富，在某些领域甚至独领风骚。近年来出土的大量龙山文化时期的精美玉器，足以证明龙山文化时期是新石器时代制玉的顶峰。在物质生活层面，炎帝神农烧山种植五谷，蚩尤以铜制兵器，舜作陶，羿作弓，伯

益与大禹联合治水等，这些都是与当时人类生产生活有关的大事；在精神生活方面，《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可见舜是主张以德治国的；同书还有皋陶作“五刑”的记载。可以说，舜和皋陶率先提出了以德治国、以法治国的理念。

对这一观点，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孟祥才表示认同，中国从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开始，就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国家治理体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理论体系，其最简单最准确的表述，就是董仲舒概括的“德主刑辅”，即“德治”和“法制”优势互补，两者紧密结合相得益彰的体系。而这个体系最重要的开山之祖，就是五帝之一的虞舜，随后经周公、孔子等人的发展，最终在董仲舒那里定型，经汉武帝认可后，上升为国家意志。“在这个事关国家和社会当前与未来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上，虞舜的虑事之精、处置之当、创始之功、前瞻之思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不仅如此，东夷文化更是齐鲁文化的重要源头。安作璋教授指出，齐文化，是以东夷文化为主，吸收周文化而形成的一种地域文化；鲁文化，即以周文化为主，吸收东夷文化而形成的一种地域文化。周朝的统治中心在西方，但随着齐、鲁两国的建立，山东地区成为东夷、“西夏”两大文明的交汇点，两种文明在此碰撞融合，最终孕育出了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齐鲁文化。孔子思想的两大理论支柱：仁学来自于东夷的文化传统，礼学源出于“西夏”的灿烂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文化是虞夏商周四代经典文明的结晶，是中国古代两大地域性文明——东夷文明和‘西夏’文明融合的产物。”

当然，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是相互的，东夷人也在不断吸收华夏文化的营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东夷与周王室经略东方的齐国打交道的机会更多，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员李楠发现，随着齐国疆域的扩大，大量东夷土著与齐人杂处，在社会生活中互相影响，东夷人逐步接受了齐人的生活习惯和风俗，同时也为齐文化注入了东夷文化的特色。

1995年，济南长清仙人台遗址挖掘的邾国贵族墓地，共清理出六座年代由西周晚期到春秋晚期的墓穴。“邾国是东夷族后裔，随葬礼器多为偶数组合等符合东夷传统礼俗，随葬有大量周式礼器、玉礼器、车马器等则符合周王朝礼制。”李楠由此判断，经过两周时期齐国对海岱地区东夷的征服，华夏与东夷文化逐步融合，至战国时，以齐文化为代表的华夏东方文化圈得以形成。秦统一六国后，齐地被列为郡县，夷夏诸民皆散为编户，华夏文化混而为一，融为一体，东夷文化的华夏化进程至此基本得以完成。

可见，齐鲁文化并非凭空而来，而是由殷商文化、周文化和东夷文化，在长期影响、渗透、交流、融合过程中，慢慢孕育而成。当然，作为齐鲁文化的来源，各种文化的地位、作用并不相同：周文化无疑占据着主导地位，在社会上层建筑方面尤其如此，从而保证齐鲁两国社会制度基本一致。而殷商文化和东夷文化处于次要地位，它们对民间礼俗、道德、习惯等产生的影响更大些。

在《西游记》中，女儿国的故事发生在第五十三回、五十四回。吴承恩笔下的女儿国正式的名字叫做“西梁女国”，是个“农士工商皆女辈，渔樵耕牧尽红妆”的国家。很多人认为“西梁女国”的原型就是玄奘大师在《大唐西域记》中所提的“东女国”。但按照记载，玄奘大师并没有真正到过这个国家，只是风闻那里的传说逸事，那这个东女国在历史上到底存在吗？

抛开玄奘大师的记载，我们发现还有许多文献资料都提到过东女国，比如《隋书》上就写道：“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王姓苏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通典》也说：“女国，隋时通焉，在葱岭（即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国王，王姓苏毗。”隋唐人关于女国的认识是真实的，因为开皇六年（586年），女国曾遣使朝贡，它位于葱岭以南的这一地理位置也不会有误。

按照史籍记载，东女国以女权为核心立国，除了国王之外，该国还有个小女王，类似隋朝“丞相”的角色。女王每五天上一次朝，处理军国大事，小女王协助管理。在东女国，国王被女性终身把持，而且后继者也必是女性。

王位的具体继承途径有二：一种类似中国远古时期的“禅让制”。在女王死后，朝中的大臣从女王族人中选取贤女二人，一为女王，次为小王，共主国政。若大王死，即以小王递补；二是类似中国的父死子继制度，不过在东女国演变成了“姑死妇（即侄女）继”，即由侄女继承姑母王位的制度，至于女王为什么不选择自己的女儿继承王位，因为史料记载的匮乏，我们无从得知。

与小说中的“西梁女国”不同，东女国是有男人的，不过男人的地位十分低下，主要职业就是从事征伐战争和种田。此外，外交也是男人的特长，东女国向唐朝所遣使者即皆为男性。但其职责只在于执行，而不能参与决策国事。可以说，在东女国，“妇人为吏，男子为军士”为其基本政治特征。

作为一个女权为核心的国家，东女国的风俗文化非常富有特色。

首先是重女轻男的风俗，史载“其俗贵妇人，轻丈夫，而性不妒忌”，这一点在婚姻问题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在中国古代，一般来说有地位的男子都会有侍妾，但是在东女国正好反过来，女子身边尽是“侍男”，不仅达官显贵周边面首无数，甚至连出身贫寒的女子，也有数夫，生下的孩子也从母姓。至于男性，无论身份如何，都类似于“西梁女国”中的“人种”，地位十分低贱。

这是典型的女权制度和一妻多夫制度，也就是说，在我国隋唐时期，东女国仍处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

其次，东女国的信仰和丧葬制度也很独特。东女国人“俗事阿修罗，又有树神”。阿修罗是古印度神话中的恶神，因常与天神作战，后世乃以之为战神。战神阿修罗与树神崇拜反映了部落战争的加剧与狩猎业的生产生活之现实。与我国一样，尊崇二神时要进行祭祀，东女国的祭祀品主要有二：人或者猕猴。

至于丧葬方面，东女国盛行“二次下葬”，其风俗与中原迥异。东女国人死了之后，先被剥皮，然后取骨肉与金属一起放到瓶中埋到地下。一年之后，再把瓶子挖出，将之前剥的人皮放入瓶中，再次下葬。在内迁后，习俗依然不改，但又吸收了中原的一些文化习俗，“居父母丧的三年，服饰不改，不栉沐”。

东女国人有服青色和赭面之俗。女王服青毛绛裙，被青袍，袖委于地，冬则羔裘，饰以文锦，雍容华贵。整个国家崇尚青色，连该国的男子也以青涂面。不过因为青色的贵重，人们只在节庆场合涂抹，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以赭色涂面，居丧期间则以青黛赭面，衣服皆黑。

按照《旧唐书》的记载，东女国南北长20天的行程，东西长9天的行程，如果按照过去一天骑马40公里或者步行20公里，那么东女国应该南北覆盖400公里到800公里，东西覆盖180公里到360公里。

这个面积并不算小，也因其地域广阔，《旧唐书》关于东女国的记载非常详细，但是到了唐代以后，史书关于东女国的记载几乎就中断了。东女国到底去哪儿了？

这还要从唐玄宗时期说起。唐玄宗统治下的中国，号称“盛唐”，四方的少数民族无不臣服于唐朝的雄厚国力，可就在这繁花似锦的时候，一场“安史之乱”猝然而至，八年征战，让唐朝的国力消耗殆尽。此时，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窥探到唐朝的虚弱，开始有了“自立为王”的念头，位于青藏高原的吐蕃便是其中的代表。自唐朝中期起，唐军与吐蕃军队混战一百余年，在这过程中，唐朝逐步招降一部分吐蕃统治区的少数民族到内地，当时唐朝把8个少数民族部落从岷山峡谷迁移到大渡河边定居，这8个部落里面就有东女国的女王所率领的部落。

当时东女国女王到朝廷朝见，被册封为“银青光禄大夫”，相当于现在的省级官员。后来到了唐朝晚期，吐蕃势力逐渐强大，多次入侵到大渡河东边，唐朝组织兵力反击，在战争中，东女国的这些遗留部落，为了自保就采取两面讨好的态度。最终，因为唐朝兵力的虚弱，东女国终究被吐蕃所征服。

东女国被征服后怎么样了？因为没有史料记载，我们无法揣测，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有些东女国的遗留部落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女王死后没有保留传统习俗，逐渐演变成父系社会。不过从吐蕃文化中妇女较高的地位、一妻多夫的风俗、赭面以及丧葬制度等之中，仍可看到东女国文化的影响。

【短史记】

《西游记》中唐僧到过的女儿国，真存在吗

□朱文龙